一

难忘故乡

衰败零落的家

我出生在湖北武汉。我家住在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城内离江边不远的一条弄堂中。我家不是这里的老住户，而是从武汉东南二百来里的大冶迁来的。据说是靠了祖上的阴德，其实是仅凭自己的努力，到我祖父那一辈，居然混得颇有起色。我的祖父伍伦奎和父亲伍理钊，都在大清朝驻武昌的湖广总督衙门下属的一个小机构里，谋到了一个专管抄抄写写的文书之类的差使。虽然“俸禄”有限，到也收入固定，生活正常，全家人衣食有靠。一度达到了小康之家的生活水平。

1908 年 3 月，伍家又添了一名男丁，这就是我。我的母亲朱三姑，原是湖北阳新的农家女儿， 19 岁

就来到伍家，一共生过八儿二女，我是其中的老四。可惜我以后的一弟一妹幼年时就不幸夭亡，留下的七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都没能活到解放，只有我和一位七弟幸存下来。

就在我出生的这一年，正赶上光绪皇帝“驾崩”，慈禧太后“归天”，三岁的溥仪“登基”称帝，列强势力大肆侵入神州大地，中华民族正处于严重的灾难和混乱之中。这种状况延续了几年后，我刚够三岁半时，也就是 1911 年 10 月 10 日，在我的家乡武昌，爆发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。我当时才是三岁多的娃娃，当然不了解那是怎么回事。只知道那天晚上，又打枪又开炮，吓得我们全家娃娃不敢动弹，大人不敢出门。很久以后，才逐渐从大人们口中，知道那次是“孙文造反”和“武昌首义”，是改变我国历史面貌的一次伟大革命。

随着清朝总督衙门的突然垮台，它的下属机构也“树倒猢狲散”，我祖父和父亲在那里的差使一下子也被“革”掉了，我们全家人赖以生存的惟一经济来源，同时宣告中断。最初几个月，还靠一点可怜的积蓄勉强生活着；后来就得靠变卖一些东西，才能维持大大降低了的生活，再往后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，家境迅速降为城市贫民。我的祖父又愁又急，再受了些饥寒，一病不起， 1913 年溘然长逝。

尚留人间的老祖母同我的父母一起，拖着我们一群嗷嗷待哺的娃娃，过起了捉襟见肘的艰苦生活。我的一弟一妹，就是在这种困境中，相继病死的。由于我们无力交付原来的房租，全家只得搬出住了多年的较好的房子，换到一处差些的屋里安家。住了一阵，连这样的房子也住不起了，又被迫搬到更差的房子里住。后来就连这更差的地方也住不起了，就一搬再搬，一连搬了四次家，才在一处贫民窟里安下身来。

我父亲为全家人的生计和自己的出路，到处求亲托友，找到了过去相识的吴元泽，请他给予帮助。吴元泽正要去北京谋事，见我父亲求助于他，不免动了恻隐之心，决定带我父亲同去北京，看看能否捎带着也找点事做。我父亲好容易得到这一机会，也就怀着满腔热望，告别了老母和妻小，随吴元泽进京去了。在那里父亲挂上了一个“候差”的空衔，大概同现在“待业”的意思差不多。不过当时有了那个空衔，就可以向官府领得一份数量很少的干薪，比一文没有是强了一点。我父亲在北京“候”了很久，却什么“差”也没有“候”到，一人落魄在外，分外潦倒凄凉，加之悬念家小，只得垂头丧气地返回武汉。

父亲为了给久别的家人和孩子多少一点欢乐，还特地为我们带回来一点“珍贵的礼物”。那是什么呢？现在说来真是既辛酸又可笑，他千里迢迢地带回来

的，并不是什么稀罕东西，竟是几个“心里美”大萝卜。我们这群连饭都不易吃饱的穷娃娃，居然吃到了来自京城的、号称“赛梨”的“心里美”，岂不是一大快事？可是我们当时不太懂事，只顾欢乐地分食这几个萝卜，却没有注意父母双亲正背着我们在悄悄拭泪呢！……

父亲终日东奔西走，到处求告无门，家里凡是能换钱的东西早已变卖一空，为了不使全家饿倒街头，只得多方寻找零活干。父亲发挥所长，找到某家学校，为学校抄写讲义和誊写石印蜡纸，每写一页可得几文铜钱，苦抄两日也可挣下几升米粮。但是这活儿并不是每天都有，所以家里仍然常常无米下锅，无柴生火，因此，我们兄弟几个不得不到处拾柴草、掏煤渣以至拣菜帮等等。单靠这些当然无以为生，父母又找到门路，为火柴厂糊火柴盒子。每当家里领来工料，上至年迈的祖母和父母二老，下至我们全体娃娃兵，一齐动手，埋头苦干。

由于米面太贵，我们不得不以粗粮杂粮为主，最便宜的红苕，北方叫白薯，成了我家最经常也是最美味的主食。红苕本来在市内也可买到，但我们总是还嫌贵，就由我同哥哥沿江边跑出城外十几里路，找到正装运红苕进城的船，求农民直接卖些给我们，经过讨价还价说好话，多少就便宜一点。尽管我们每趟来

去都要费几个小时，又扛又背累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但是能买到较多一点家用口粮，还是满高兴的。

我们人口多，开始的住房还分成四小间，以后为了再省开支，又让出了一间，全家十口人，挤住成了堆。那房子，薄瓦盖顶可以见天，烂板作墙难遮风寒，下雨就漏，刮风就透。夏天热得无处可躺，冬天又冷得无洞可钻。每天睡觉时都要临时搭铺，天明后马上掀到一边，不然全家人就没处落脚了。我因为每晚同奶奶一床睡，总算有个比较固定的床位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保证我们全家人食能糊口，衣能蔽体，应该归功于我的妈妈。她以自己的全部心血和辛劳，支撑起我们这个十来口的家。她不仅管给全家人做饭、洗衣、缝补和收拾里外，我家上至老祖母，下至我们这群娃娃，每个人脚上穿的鞋，也全部出自她的巧手，从我记事时起，就见她年年月月不间断地糊鞋帮、扎鞋底和绱新鞋。她还自备了一把剃头刀，亲自动手按时给我们剃头理发。仅仅这两项，就为全家人节省了不少开支。几十个春秋过去了，可是母亲当年劳苦的身影，却一直镌刻在我的心上：她在烟熏火燎中为我们烧饭煮红苕；她在昏暗灯光下为我们做鞋补衣衫；天不亮她就在扫地提水，别人已歇息，她还在刷锅洗衣；她从不为家穷唉声叹气，也从不对我们生气发火，一年到头，每天每晚，都是这样

默默地劳动着。在她四十多岁时，我的父亲就去世了，以后我的三个哥哥又相继病故，我则早离家参加了革命，全凭母亲独力支撑着这个日渐衰败零落的家。

“迟到”的小学生

1917 年，俄国发生了伟大的十月革命。1919 年，我国爆发了五四运动。当时我才 11 岁，不懂得甚至都不大知道新发生的这场革命，不过我却亲眼看到五四运动波及到武汉时的情景。有一天我正到蛇山去挖做炭巴的红土，看到满街都是游行示威的学生。原来，武昌的各个大中学校，得知北京发生了这一革命运动，纷纷起来响应支持。这天到处都是各校的学生游行队伍，街道两边挤满了围观的人群。我看见那些游行的大中学生，手里挥动着各色小旗，一边慷慨激昂地高呼着口号，一边兴奋地大步前进着。他们喊的口号我不大明白其中意思，只听出是反对什么“二十一条”，要打倒某个“卖国贼”。当天晚上，武昌各校学生又举行了提灯大游行，其场面更是壮观。我作为一个最热心的观众，忍不住又去看了热闹。当时真是灯走蛇龙，明光闪耀，映红夜空，满城生辉。虽然我还不太理解这一行动的重大意义，但是却被那些青年学生们的热情精神所感染，对他们这样有声有色的活

动十分敬佩和羡慕，那个声势浩大的场面，更是令人难忘。

我由于家境贫困，一直没有机会上学，只由父亲间或教我们兄弟认过一些字，一位叔父还教我读过《四书》，因此我虽未入学，却已识字，还会背诵几段“子曰，学而时习之”等等。至于意思，我看连教我的叔父在内，也未必真的懂得。我的邻居——一位工人的孩子，设法进了武昌高等师范附设的一所“单级学校”读书。1920 年春节前夕，他找到我说，他们那个学校，过年以后准备招收几名插班学生，问我想不想去，又说这个学校是试办性的，学生可以免缴学费。我一听自然喜出望外，说当然想去，忙回家禀告了父母。他们当然赞成我去。这样，年节一过，那位热心的邻居孩子，就把我领到他所在的“单级学校”里，由老师对我进行了一番考试，就被顺利地录取了，成为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的插班生。那时我已经 12 岁了，如按正常情况，应是进中学的年龄了，可是我才刚刚走进小学门，是个“迟到”了的学生。

我进入学校以后，感到自己开始了一种陌生而新鲜的生活，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有意思。其实它是一所很不正规的学校，同现在城市中的学校是大不一样的。全校只有一个老师和一间教室，但是却有四个班，也就是初小的四个年级。每班十多个学生，总共

四十多名，全由这一位老师来教。

1921 年夏，我才在那里上了一年半学，省里的教育部门就说经费不够，要下令停办这所学校，使我又面临失学的危险。老师也为我可能失去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深感惋惜。就在他的大力推荐下，疏通了有关方面，让我免费进入武昌高师附属小学继续读书，并且照常升入四年级，这才使我没有中断学习。这所学校不同于“单级学校”，十分讲究“正规”，每个学生必须按学校规定穿统一的校服才能入学。我家穷得连饭都吃不上，哪里有钱做什么校服呢？经过再三请求申述，加上有关老师的同情谅解，终于在同意我免缴学费之后，又允许破例地不穿校服上学。于是，我就穿着家常的旧布衫，背着自制的小书包，出现在整齐划一的学生行列里。外来的讥讽和嘲笑是免不了的，自惭形秽的情绪也不是完全没有，可是我咬咬牙挺住了。

由于老师和同学的帮助，加上自己的勤奋学习，我在学校的功课一直很好，从入学到毕业，每年考试我都是名列第一。我不仅在主课上总是名列前茅，体育成绩也很出色。有一次全校开运动会，按年龄分为甲、乙两组，我被分在乙组，结果乙组的冠军几乎全被我囊括了。由于我抓紧体育锻炼，身体相当结实，同学们送给我一个绰号，叫做“台炮”，这是湖北人

形容体格健壮的叫法。我成了学校的各种文娱和体育活动的骨干成员，经常代表学校参加校外的活动。武昌高师附中、附小的游艺会演，我也去参加了。我有一位老同学，建国后在武汉从事文化工作，前几年他对我说：“武汉地区的戏剧史，应该把你也写上去，因为在 20 年代的前期，你曾经是一个相当活跃的业余演员。”这话倒也有点根据，那时我校每次排演新剧目，照例都有我的角色，还总是演主角，也许老师们认为我的体格和气质比较合适，又总是让我担任正面角色。

加入“CY”

1922 年秋，我正升入高师附小五年级，一位新来的陈老师担任了我们的级任老师。这位陈老师二十五六岁，生得方方正正，浓眉大眼，满面春风，透出一股正气，一见他就觉得可敬可亲。也许因为我在班上成绩比较突出，年龄又稍大一点，他来到不久，就同我经常交谈，相互间很快熟悉起来，建立起了相当密切的关系。在与他越来越多的接触中，我感到这位陈老师不仅是我学习上的老师，更是我人生的导师。从他那里，我听到了许多从未听过的、却又是无可置疑的生活真理。他在我面前，打开了一扇明亮的思想之窗，使我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。

这位老师，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，党的一大代表和湖北地区负责人之一的陈潭秋同志。

陈潭秋同志到我们学校，一面担任着教师的公开职业；一面领导着湖北地区党的工作。作为级任老师，他亲自承担了几门课的教学任务，不断地利用讲课的机会，将许多革命道理和社会知识，点点滴滴而又深入浅出地灌输到我们的头脑中。例如他在讲授历史课时，反复地对我们说，不要仅仅从历代帝王的更迭来看待历史的演变，而要从经济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迁，来考察历史在如何前进。他还对我们讲解了社会发展史，从劳动怎样创造了人类本身，讲到一种新的更先进的社会制度，必然要取代旧的落后的社会制度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规律，每个要想对社会有点贡献的人，必须了解和顺应这条社会发展规律，努力使自己站在推动社会前进的一方面，而不是站在与它相对立的反动势力方面。有一次我问他：“许多像我这样的穷孩子，都上不起学，你看该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，而是一个社会问题。即使由于某种原因，个别人偶然上了学，整个社会的问题仍然存在，你自己就是个例子。要根本解决问题，只有彻底推翻旧社会，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，所有的穷孩子才能都获得上学的机会。”陈潭秋同志还用许多现实例子，启发我们反对帝国主

义的思想。他指着那时在武昌和汉口之间停泊的一艘艘外国军舰，让我们好好想想，为什么这些洋船兵舰，能在我国内河长驱直入？这些外国军舰上的大炮，日夜对着我们的国土，到底是要干什么？作为中华民族的新一代子孙，能不能长期容忍这种状况？这些问题，很快在我们心头激发出反帝的火花。

社会的不平，国家的不幸，深深地刺痛了我们这些开始观察社会和思索人生的少年的心，陈潭秋同志正好成为我们思想上的启蒙人，接着又成为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个引路人。

经过陈潭秋同志对我们进行了一年多的教育和考察，党组织决定将我和另外两名同学吸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，陈潭秋同志亲自做我的入团介绍人。1923年冬，他同武汉党组织负责青年团工作的何恐同志一起，主持了我们的入团仪式。下课以后，陈潭秋和何恐同志带着我们几个人，在一间小屋子里，悄声地、更是庄严地通知我们说：“组织上批准了你们的要求，同意你们成为党所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。从今以后，你们就不再是普通的学生了，而是一名先进的革命青年，我们也不仅是普通的师生关系，而是革命的同志。我热烈祝贺你们成为我们的同志。”他和何恐同志还对我们讲了不少青年团的任务，对团员的要求，今后的工作等等，同时决定由我和另两名

一起入团的同学，组成高师附小的第一个团小组，并指定我为第一任小组长。

从那一天起，我虽然还像平时一样地上学做功课，但是内心里好像突然长大了。当时人们把共产党员叫做“CP”。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本应称做“SY”，但是多数人却沿用了共青团的简称，即“CY”。那时全国还处于反动政府和军阀的黑暗统治下，加入“CP’,或是“CY”都是极其秘密的，根本谈不到有什么个人利益和好处，相反要准备被捕、坐牢甚至掉脑袋。不过因此却使每个“CP’，和‘CY”成员，增加了一种光荣感和神秘感。我也觉得自己成了一名“CY”，确是件十分了不起的事，认为自己已不再是一个平常的受人欺凌的穷孩子了，而是一名有理想、有目的和有组织的青年革命者，心中常常充满了一种英勇献身的自豪感。

我入团以后，团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继续物色志同道合的革命青年，对他们进行考查和了解后，逐步吸收到团组织中来，以不断发展扩大“CY”的队伍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，我们有选择地向组织上推荐了一小批进步青年，不久，组织上批准我们一一吸收了他们。我们这个团小组，就由最初的三个人，发展为十名团员了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团小组对党在高师附小和当地的工作，起了一定的助手作用。

陈潭秋同志在高师附小任教期间，曾经一度离开湖北，到江西安源从事过一段工运工作，不久又返回武昌，继续领导着武汉地区党的工作， 1923 年下半年，我已由高师附小五年级升到六年级，陈潭秋同志也不再担任我们的级任老师了。不过我又遇到了另一位好老师，他是六年级的级任老师张朗轩先生。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学习上，他都给了我许多帮助，成为我的又一个终生难忘的恩师。

20 年代前期的武汉，革命气氛还比较浓厚，我们学校的党团组织经常根据上级的指示， 组织发动一些革命活动。这些活动通常由几位进步老师公开出面主持，我们则当他们的助手和活动骨干。比较大的活动有好几次，有一次似乎是在 1924 年春，我校三年级以上的同学，一齐走上街头，进行了一次颇有声势的游行示威。记得我们的游行大队从学校出发时，同学们每人拿着一面小纸旗，上面写着“打倒帝国主义”、“打倒军阀”等革命口号，一边振臂高呼，一边阔步走向街头。 由于我党正同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合作，支持孙中山先生实行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，所以队伍中也打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。整个游行的领队是钱介磐老师，他也是一位共产党员。在国共合作时期，他和许多党员同志一样兼有国民党党员的双重身份。这种由“国民党党员”带

队、又打着国民党党旗的游行，就使这次活动增加了一层保护色，避免了反动势力可能的纠缠与捣乱。

作为游行大队的殿后，是一支由几十名学生组成的“笛鼓队”，其中有十多支竖笛、几支铜号，还有几面大小军鼓。一路吹吹打打，加上游行大队的高亢口号声，十分嘹亮引人。我也在这支“笛鼓队”中，不仅是这次活动的积极骨干，也是实际上的“吹鼓手”之一。

1924 年夏，我在高师附小六年级毕业，结束了连“单级学校”在内的共达四年多的学习生活。在毕业离校时，我对这个小小的革命摇篮万分留恋。我在这里的生活，实际上影响和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。不仅如此，高师附小的校址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，尤其是对于湖北的党组织来说，它还是一处很有纪念意义的地方。它是党在武昌的革命活动中心之一。1927 年 4 月召开的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，就在附小的礼堂里举行。毛泽东、瞿秋白、蔡和森和刘少奇等党的领导同志，以及罗易、鲍罗廷和维津斯基等共产国际的代表，都到这里参加过会议。武昌高师附小的校址还在，现在叫武昌中华路中学。

在大革命的洪流中

我从高师附小毕业后，便外出寻找职业，好分担

家庭的困难，用劳动养活自己。正好打听到武昌的“共进书社”要招收学徒。我参加了书社的考试，结果被顺利地录用了。我告别了学校和家庭，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，年龄才刚过 16 周岁。

由于我刚学徒，书店的业务还不太懂，经理开始只让我做些粗活跑跑腿，里里外外搬运书籍，再给几家学校送书。干了一阵杂活，经理又叫我帮助誊写账目，在体力劳动之外，又增加了脑力劳动的内容，似乎是“提升”了，其实只是加大了我的劳动量。

后来，我的生活又发生了意外的转机。我原来在高师附小的同学，经常来“共进书社”购买书籍和文具。他们见我放弃学业，到书店当了学徒，都为我的失学感到非常惋惜，几个家境较好的同学，自愿凑钱帮助我缴学费，希望我能同他们一起上学。我回家与父母亲商量后，中止了书社的学徒生活，在同学们的热心支持和实际支援下，插入武昌高师附属中学的一年级，继续上学读书了。

高师附中离我家有十来里路，我每天步行上学，来去得费两个小时。由于路远，中午就不能回家吃饭，又没钱在学校里搭伙，只得用零钱买点大饼充饥。有时零钱花完了，家里更挤不出一个子儿给我，我就得饿肚子。那时不仅我自己经常饿肚子，有一次连家里也断了炊，连着几天揭不开锅，全家人饿得东

倒西歪，我还得咬着牙强打精神照常上学，那股辛酸苦涩的滋味，真令人永世难忘啊！正在我和全家人都一筹莫展走投无路时，又是我的一位最亲密的同学，看出了我的气色不对，细心地问出了我的隐情，马上解囊相助，送我一枚银元救急。我双手接过了这枚银元，更收下了这位同学的好心和无限的同情，急急送回家去，用它买了一些米粮，使全家人渡过了一次不小的难关。

我在高师附中读书时，参加革命活动的热情十分高涨，我们的任务同在附小时相比，也更加复杂多样了。最经常的工作是外出散发革命传单，张贴革命标语。1924 年五一国际劳动节，我们奉命沿着武昌长街，直接向过往的行人递送传单，这就要靠自己选择并看准对象，哪些人可以直接塞给他，哪种人相反得防着他。开始比较拘束小心，慢慢地就有了经验，连坐在黄包车上的人，也敢塞几张给他。有几次奉命到武昌最繁华的街道上张贴新发下来的革命标语，我们上街后先派一个人去同警察乱扯打岔，分散他的注意力，别的人就乘机快速贴出，然后各自若无其事地分散走开，等到敌人发现标语，我们早已无影无踪了。

我还参加过陈潭秋、董必武等党在湖北地区的领导同志亲自组织或主持的一些活动，比较重要的有这样几次，一次是 1924 年列宁逝世以后，陈潭秋和董

必武同志在高师附小临街楼上的会议室里，召开了一个党团员会议，有二十多人参加，其中有何恐、林育南、刘昌群和李子芬等活跃人物。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悼念和学习列宁，陈潭秋同志作了重要发言，董必武等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。我在这次会议上，是个名副其实的“小字辈”，第一次参加这样重要的集会，并第一次一下子见到那么多闻名的党的负责人，只觉得一切都是那么新鲜、庄严和令人振奋。

1925 年孙中山去世时，陈潭秋等同志又组织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公开活动，在武昌阅马场召开了一个有几千人参加的纪念大会，用各种形式大力宣传孙中山的正确主张，特别是他的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，还在会场上大量散发和出售介绍新三民主义的书籍，以及孙中山及夫人宋庆龄的合影照片等等，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宣传活动。由于活动组织得好，加之是以纪念孙中山名义召开的，所以虽然冲破了吴佩孚、肖耀南等军阀统治的禁令，他们也无可奈何，结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，扩大了我党的影响，也给武汉各界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。从开始筹备到胜利召开这次大会，我都是积极参加的工作人员之

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，在武汉激起反响，大批工人、学生和职员迅速卷入了这场新的反帝运动。武汉